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著



# 哥穆尔卡 沉浮记

— 三次转折之一 —

253

# 哥穆尔卡沉浮记

——三次转折之一——

[波兰] 扬·普塔辛斯基 著

于 欣 筱 如 译

黎 岚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Jan Ptasinski  
Pierwszy z trzech zwrotów  
czyli rzecz  
**O WŁADYSŁAWIE GOMUŁCE**

根据华沙国内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吴志坚

哥穆尔卡沉浮记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著

于欣 译  
黎岚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7 插页：1 字数：17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12-0049-1/D·8 统一书号：3003·1741

定价：███元

2.30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哥穆尔卡在群众中



周恩来和哥穆尔卡

## 译者的话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哥穆尔卡沉浮记》，原名《哥穆尔卡史实——三次转折之一》，是了解和研究哥穆尔卡1948年横遭错误打击事件的极有价值的著作。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05—1982）是当代波兰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名人物，他的一生是为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但他走过的道路却是一条历经坎坷的曲折道路。在他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过1948年、1956年和1970年三次沉浮起落。1942年，在波兰被法西斯德国军队占领时期，哥穆尔卡置生死于度外，积极参与了创建波兰工人党的工作。1943年底，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肩负起领导波兰工人党和波兰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解放祖国和建立人民政权的重任，1944年7月波兰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又为人民波兰的建设事业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但是时隔不久，哥穆尔卡却出人意料地在1948年被横加上所谓“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一下子从权力和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由人民的领袖变成了人民的“罪人”，身陷囹圄达数年之久。这是哥穆尔卡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转折。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推翻了1948年对哥穆尔卡的批判，重新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这是哥穆尔卡一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又十四年，即1970年，波兰爆发了“十二月事件”，哥穆尔卡再次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经过这第三次转折以后，哥穆尔卡默默无闻地隐居十多年，于1982年与世长辞。

《哥穆尔卡沉浮记》研究了哥穆尔卡一生中第一次转折的是

非表里，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波兰工人党内1948年反对所谓“右倾民族主义”的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1948年哥穆尔卡“所犯的弥天大罪”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一）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及其关于在人民民主国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决议的态度；（二）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态度；（三）对波兰工人运动历史传统的态度。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哥穆尔卡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波兰一个国家和波兰工人党一个党的问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在欧洲大陆兴起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新的重大原则问题，其实质就是：第一，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不应该走符合本国特点的道路；第二，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应不应该维护独立和主权，在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应不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哥穆尔卡沉浮记》一书通过对1948年波兰工人党反对“右倾民族主义”斗争有关史实的介绍，分析了这次斗争的起因、进程和结果，说明哥穆尔卡在上述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是正确的。在二次大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哥穆尔卡为了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进行了有益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胆探索。作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他的不畏权势的勇气是可钦可佩的。

《哥穆尔卡沉浮记》的作者扬·普塔辛斯基是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他生于1921年，1939年9月积极地参与了保卫华沙的战斗。1940年开始政治活动，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近卫军。波兰解放后，历任党的县委和省委第一书记、公安部副部长、驻苏大使等职。1983年退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同哥穆尔卡有较深的个人交往，特别是在哥穆尔卡退休后与之过从甚密。他在书中根据哥穆尔卡本人叙述和其他多种资料，全面阐明了1948年波兰工人党反“右倾民族主义”的真情实况，披露了战后波苏关系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成立的内幕，记述了哥穆尔卡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铁托、贝鲁特等人的关系。书中引用的许多史实都是第一次见诸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开出版物。这本书对于了解当代波兰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都有很高的价值。从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作者对哥穆尔卡充满了友谊和崇敬之情。据说，作者已将本书的续篇撰写完毕，波兰国内外读者正在期待它的出版发行。

本书涉及波兰历史上众多人物、党派、集团。为了便于查阅，我们将原书注解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重新编排，附于书后。对于波兰工人阶级政党的演变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各派政治力量的组织、团体情况，我们写了两条简要注解，一并附于书后。

1987年10月于北京



## 目 录

<b>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b> .....	( 1 )
<b>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究竟是怎么回事?</b> .....	( 24 )
正式公报的说法.....	( 24 )
对哥穆尔卡的指责.....	( 31 )
关于所谓的倾向问题始于何时的争论.....	( 38 )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方案之争的实质.....	( 44 )
旅苏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和波兰工人党中央.....	( 82 )
情报局的成立——危机的开始.....	( 93 )
关于两党统一后党的传统问题的争论.....	( 104 )
南斯拉夫问题.....	( 131 )
斯大林与哥穆尔卡的关系.....	( 138 )
几个“细小”而重要的问题.....	( 146 )
哥穆尔卡被捕.....	( 152 )
哥穆尔卡赶上的和留下的波兰分别是什么样子.....	( 162 )
<b>书中涉及的人物</b> .....	( 169 )
<b>书中涉及的组织、团体和机构</b> .....	( 207 )
<b>附 录</b> .....	( 209 )

## 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

在希特勒占领年代，虽然从1943年9月以后我曾多次到过华沙，应召同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进行谈话，但从来也没有同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维斯瓦夫会面谈话的机会和幸运。在那些年代，波兰工人党书记忙于筹划党的战略和策略，而且，出于秘密工作的考虑，不得不把自己同外界的接触限制在最亲密同事的范围之内。前任的命运——马尔采利·诺沃特科在党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十一个月后就惨遭杀害，继任者帕威尔·芬德尔又在担任波兰工人党书记十一个月后被捕入狱——这都迫使哥穆尔卡采取这样的活动方式。

当时，党面对着希特勒占领者和国内反对派的特工人员不得不采取两方面的秘密活动。我从伊格纳齐·洛加—索文斯基那里知道了这位党的领导人已化名为维斯瓦夫，知道他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无比勤奋、勇敢和富于献身精神的人。我们在华沙停留时，洛加—索文斯基负责“照应我们”，他总是热情而亲切地谈论维斯瓦夫，看得出来，洛加—索文斯基对维斯瓦夫是十分尊敬的。

中央派出雅德维加·路德文斯卡支援我们，我把她带到北玛佐夫舍地区。雅德维加在1944年6月向我讲述了她同维斯瓦夫谈话的情况。早在1942年，她在下喀尔巴阡山地区就认识维斯瓦夫，他们一起在那里组织了波兰工人党。从她的谈话中我了解到维斯瓦夫是一位学识渊博、年富力强、积极活跃和处事审慎的共

产主义活动家。

1944年秋，我们同当时国家的首府卢布林建立了电讯联系，此后，我从密码电报中得知维斯瓦夫已经到了波兰解放区，并在那里指导占领区的党的工作。发给我们所在地区波兰工人党委员会的电报，有些就是由他签署的。维斯瓦夫安然无恙，他正在卢布林指导着党的活动，这些消息给我们、给活动家们带来了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喜悦。我还没见过维斯瓦夫，没听到过他的声音，但我感到我同他息息相关。在占领年代，在残酷斗争的年代，战友之间的联系特别牢固与持久，而不管当时及其后每个人的级别和地位如何。

1945年5月27—28日在华沙举行了波兰工人党全国积极分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维斯瓦夫。当时我担任普文斯克县委第一书记。不错，解放后我早已从照片上认识了维斯瓦夫，可现在是维斯瓦夫主持会议，讨论如何从战争的破坏中重建国家，如何开发当时称为收复地区的西部和北部土地，如何加强正面临反动派武装袭击威胁的人民政权等等问题。维斯瓦夫的讲话充满了热情和铁一般的逻辑，打动着人们的心灵。他仪表堂堂，高大魁伟，头发稀疏，有些与热罗姆斯基相似。当时他才40岁。在那些年代，不仅是1945年，在党的会晤和会议上，在工会会议上，在国家 and 经济行政机关代表的各种会议上，在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上，哥穆尔卡经常发表演说，在报刊上他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他的演说和谈话，特别在米科瓦伊契克的破坏活动被揭露后，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工作路线，同时也给我们以信心和鼓舞。

当时，党内文件还不具有后来那样的意义。当时，波兰工人党的积极分子都独立地进行活动，只是以领导人讲话中的一般性的政治指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在那些年代，维斯瓦夫的讲话令人信服，深入人心，启迪思想，带动了全党。这绝不是吹捧和溢美之辞，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当时身在基层的活动家现在在一

起聚会时经常回忆起这些情景。那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只有20万左右，但党团结在维斯瓦夫周围，是统一而坚强的。在我们的心目中，维斯瓦夫和党，两者的含义是一致的。在经历多年挫折和失望之后，这可能是令人难于置信的了。

1945年12月，在华沙“罗马”大厅举行了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波兰共产党人活动中的伟大事件。这是自1918年12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翼统一代表大会之后，波兰革命运动的代表举行的第一次合法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波兰革命者几代人会面了，其中有革命潮流方兴未艾时的革命家，也有领导波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的革命家。

维斯瓦夫的报告打动了我的心，打动了聚会在代表大会会议大厅中的所有人的心。在报告中，维斯瓦夫描绘了新波兰——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所有波兰子孙的祖国的建设远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全体与会者同党的领袖心心相印的场面，是党的书记的言论迸发出来的能量、热情、信心和力量。

今天，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站在讲坛上的维斯瓦夫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抨击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呼吁组成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他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维斯瓦夫在结束语中对代表们说，“你们要到整个工人阶级中去，要告诉他们，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他们和为波兰指明了什么样的道路”。每当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代表大会时，维斯瓦夫的呼吁常常在耳际萦回。我记得，我在战前年代的思想上的导师——波兰工人运动老一代活动家弗朗齐舍克·温齐茨基，曾经在代表大会的侧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道：“这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领袖，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天才、勇气和逻辑。”我同意弗朗克大叔——童年时我这样称呼弗朗齐舍克·温齐茨基——对维斯瓦夫的评价。哥穆尔卡的美德吸引了我，我倾倒在他的面前。

1946年1月，我开始在波兰工人党华沙省委工作，任部长。这是特别困难的一年，阶级斗争燃起了社会的情绪；米柯瓦伊契克组建了与人民政权对立的波兰农民党之后就展开了攻势，地下的武装势力同他在一起兴风作浪。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把主要矛头指向波兰工人党，竭力阻挠创建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在首都的群众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在两党积极分子会晤时，我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聆听哥穆尔卡发表演说。哥穆尔卡的话同那些年代的现实一样严峻，他从不掩饰我们面临的重重的政治困难和我们自身的弱点。他揭露了米柯瓦伊契克的阴谋以及米柯瓦伊契克同地下武装的联系，指出了波兰反动派的国外保护人从事的反波活动。在这场斗争中，他以必要的论据武装了全党，同时动员全党投入艰苦卓绝的拚搏中去。他启发一切善良人们的理智，号召他们建设遭到破坏的国家，号召他们保持安静。

维斯瓦夫在那些年代的演说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准确地论述人民的历史，力图从人民的挫折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与此同时，哥穆尔卡具有清晰地表述思想的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我们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赞同他的讲话，这时会出现一个没有导演的场面，人们自发地欢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制造个人迷信气氛的意图，这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尊敬和信任的表现，是党同自己的领导（维斯瓦夫是其体现者）团结一致的表现。今天，没有经历过浪漫主义和求实精神特殊结合的一代人，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话。

1947年秋，中央委派我到热舒夫省担任波兰工人党省委第二书记。我见到哥穆尔卡和倾听他讲话的机会少了一些，但我却有可能会了解了他的生长和受教育的环境<sup>①</sup>。我遇到了一些曾同维斯瓦

<sup>①</sup> 哥穆尔卡于1905年2月6日生于原热舒夫省的罗斯诺。——译者

夫一道成长和活动的人，了解了形成他性格的条件。在后面的几章中我将顺便写写哥穆尔卡的个性和性格，因此，了解下喀尔巴阡山的现实，特别是了解两次大战期间的那些年代，对我是非常有益的。

我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党校经历了当时党内发生的转折——批判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这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一代波兰共产党人是第一次巨大的政治震动。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一位领导全党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的领袖人物，竟然遭到排斥和谴责。今天，我们在“破除迷信”方面的抗病力较强，但在当时，我很难理解，更难接受。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是在哥穆尔卡的引导下，党率领劳动群众胜利地取得了国家政权，是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击退了企图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回国家政权的反革命联合势力的进攻。所有这一切，还都是昨天的事情，还活生生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党校和党中央同在一座大楼内，校门朝向玫瑰街。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是在老楼第六层的大厅中举行的。我们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隔壁发生的一切。但有关8~9月中央全会的情况透露出来的很少。那些年代，党内说话要负责任，这条原则比后来更为严格地遵守着，党内秘密这一概念还没过时。在党校学习的学员，同所有高等学校一样，都是成年人，有经验的人，有些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只一次面对过死亡。党校沸腾了，尽管没有集会，没有会议，没有那样明显的表现。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孤独地感受着事态的发展，只同最亲密的同志谈谈自己的疑虑。一种丧葬的情绪笼罩着党校。我们贪婪地抢阅报纸，想从已公布的材料中找到能够解释我们疑虑的答案。

在当时公安部俱乐部大厅举行的关于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的党中央积极分子会议给我的印象不佳，也可能因此使我不会忘却这次会议。以波兰工人党中央新任总书记鲍莱斯瓦夫·贝鲁特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已经被解除职务但仍

留在政治局内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也出席了会议。我和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哥穆尔卡的身上。他是正在发生的悲剧的主角。维斯瓦夫有些萎靡不振，孤独和疲倦，显然是受到了冲击。会议明显地对他表示了不信任的态度，尽管如此，所有的人都在期待他的讲话。我也焦急地想听听维斯瓦夫会讲些什么。他的话坚定、诚恳，铭刻在我的心中。他说：“请你们去告诉大家，尽管维斯瓦夫迷失了方向，但他永远同党在一起。”那些“清白的人”发表了歇斯底里的演说，要求对哥穆尔卡采取严厉的制裁，使大厅中的气氛变得白热化，也使我感到吃惊和压抑。（那些人，正象维拉·科斯特热娃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常有理，从来不犯错误，永远“跟得上路线”。）我怀着极其迷惘的心情离开了会场。

党中央积极分子会议后不久，党校举行了学员和教师联席会议，谈哥穆尔卡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根据党校校长塔戴乌什·达尼舍夫斯基的报告，大家展开了讨论。多数学员发了言，谨慎地表达了对各种问题的怀疑，并提出了要求解答的问题。我也是发言者之一。会后，达尼舍夫斯基找我谈话，竭力消除我的怀疑。谈话的时间相当长，是一次彬彬有礼的愉快的谈话。我知道，另外还有一些同学也被校长请去谈过话。

关于“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问题，容在书中的有关章节再谈。现在我想探讨一下是由于什么原因党及其活动家竟如此迅速地同意抛弃自己敬重的和功勋卓著的领袖人物。我不隐瞒，我也想寻找一些“宽恕”自己的理由。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就好像滴水穿石一样使我们的怀疑消失了。第一，就是维斯瓦夫的自我批评，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在怎样的精神压力下作出的自我批评，可在当时我们都信以为真了。第二，就是中央委员会（包括那些被列入哥穆尔卡追随者集团的中央委员在内）对维斯瓦夫进行了一致的毫不含糊的批评。这是严酷的事实，不讲清楚就难以理解哥穆尔卡撤职后的整个过程。而要想理解哥穆尔卡追随者的

态度，就必须考虑到当时经常在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的名义下强加给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快，我的怀疑也消除了，我也认为“右倾民族主义倾向”是反对党的利益和波兰利益的活动。

维斯瓦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静悄悄地离去，不再在公开场合出现，不再发表演说了。党开始准备召开统一代表大会，而统一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是在反对哥穆尔卡主义的气氛中进行的。

波兰工人党团结在新任领导人贝鲁特的周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参加了统一代表大会。哥穆尔卡也是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主席台上就座。他不再沉默了，他决定向与会代表们发表演说。他想证实自己是有道理的，他不认为他的讲话以及他的观点会给党带来什么损失。但他碰壁了，他不为人们所理解。代表们对他的演说的反应是沉默和冷淡。我也不赞赏他的这次讲话，我甚至责怪他为了个人问题利用了统一代表大会。我觉得哥穆尔卡并未意识到，在持续数月的反对哥穆尔卡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党内对他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不排除，很可能他认为自己在9月份承担的“过错”太多了。总之，人们认为，维斯瓦夫的演说是从过去所作的自我批评上后退了。很明显，正是按照这种认识，策动了对他进行反驳。今天重读哥穆尔卡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同当时直接听这一演说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当时了解得太少了！

1949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三中全会重新提出哥穆尔卡问题。此前，爱德华·奥哈布在《新路》上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当时，我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热舒夫省委第一书记，我事先并不知道中央全会的议题，这可能是因为热舒夫离首都太远，也可能是因为我刚上任几个月，还没有一条“通天的小路”。直到听贝鲁特报告时，我才意识到“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又被提到党的最高论坛上来了。现在，哥穆尔卡追随者的范围扩大了，甚至不久前还在指责哥穆尔卡的一些人也被包



括进去了。对哥穆尔卡的责难是尖锐的，几乎是指控为叛变。当贝鲁特说话分量极重的时候，大厅里好象刮起了一股冷风。但是，坐在大厅里的人，除了那些被指责为有罪的人之外，无人怀疑这些指责的真实性的。这是维斯瓦夫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中央全会在部长会议的圆柱大厅召开，他孤独地坐在桌子右边最末的位置上，所有的人都远远地离开他，所有的人都攻击他，我自己也不例外。

哥穆尔卡出色地进行自卫，他批驳了指责他的论据，挑明了事理，并展开了反攻。他讲话慷慨激昂，语气坚定，富有勇气。这时的哥穆尔卡，已经不是一年前在公安部俱乐部大厅中我所观察到的心情压抑和消沉的哥穆尔卡，而是1945年至1947年站在人民讲坛上勇敢而坚定地、流畅而雄辩地发表演说的哥穆尔卡。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当时他已经觉察到威胁他的危险，他意识到他在进行一场保卫自己的生命，保卫自己的头颅的斗争。

这次全会主要是对哥穆尔卡进行了为时两天的大规模围攻。攻击是尖锐的，而且往往是不择手段的。那种气氛使我招架不住了，我自觉自愿地去登记发言。这是我在中央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很遗憾，第一次讲话就把矛头指向了哥穆尔卡。我当时的观点，已经真实地包含在我发言的内容中。也就是说，我开始时的摇摆早已成为过去，早已忘得无影无踪了。几年过后，当我回忆往事时，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那次发言的内容。那是我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羞于发表的讲话。确实，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艰难的、复杂的、令人痛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历史本身来承担责任，我们应当有勇气引疚自问。我从那次不幸的讲话中得出了教训，此后我再也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哪怕有人希望我如此我也不干。

令人奇怪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哥穆尔卡的名字是如此轻易地消失了，生活是如此迅速地把那些有影响的人物忘记了，把那些